

《影子银行》的三重意义

□汪树东

当前中国作家中，袁亚鸣的身份和经历无疑是较为独特的。他曾是典型的商场中人，当过银行信贷部主任、基金管理公司经理、期货有限公司总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等，投身于火热的时代生活熔炉中，对当今中国商场诸多隐秘洞若观火。因此他的长篇小说如《终极破产》《生死期货》《牛市》等几乎都是围绕着期货、基金等商战题材展开，展示出商战中别一种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由此透视该行业中的人性波澜。如今，他再次推出长篇小说《影子银行》，聚焦于20余年来东部沿海某地区的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以浓墨重彩的笔触渲染出各种商战的惊心动魄，波诡云谲，把金钱巨压下的人性畸变悲剧展示得淋漓尽致，从而为时代立碑，为国人觅魂，为人性高歌。

在笔者看来，袁亚鸣的长篇小说《影子银行》的第一重意义就是对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的深度描绘的题材开拓意义。

众所周知，古典中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现代中国则日益从乡土向都市进发。与之相应，现代中国小说中，乡土小说最为盛行，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当今称霸文坛的重要小说家几乎都是以乡土小说名世，他们对现代都市生活似乎具有与生俱来的疏离感和拒斥感。不过，经过20世纪80年代新写实小说家、90年代新生代小说家的顽强努力，都市题材也在当今中国小说中慢慢站稳了脚跟，五光十色、缤纷绚丽的都市形象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但在既有的小说景观中，像袁亚鸣的《影子银行》这样如此深度、全面地呈现20余年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的戏剧性一面，还是绝无仅有、弥足珍贵的。

该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亚东和双奎艰苦奋斗、屡败屡战的人生历程就和民间金融、期货贸易紧紧纠缠在一起。亚东的最大理想就是当银行家，创办私人银行。但是在中国大地上，他这个理想又难于上青天。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错位让他屡屡陷入步步见血的荆棘之途。因此当我们看到他在导师卢林申面前为私人银行的理想而呐喊时，我们也不得不为之仰天长叹：“把他旅行袋里的钱一把一把往外掏，我有钱，我有钱，很多人有钱。为什么就不能让这些钱冠冕堂皇地开个银行？为什么让这些钱要像老鼠一样在地下管道里，在阴沟里做高利贷呢？到底谁在成就高利贷？那些人，那些放高利贷的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权利做人做的事，那些借钱还钱的事他们也会做，让他们也去开个银行，给他们规矩，让他们去做，就没有地下水庄，就不会再死人了啊。为什么就不能呢？你说说。”亚东说着又搡了卢林申一把，说，“让他们自己开个银行吧，让他们冠冕堂皇去做有什么不好呢？几百年了，几百年来他们你死了他做，他死了我做，为什么就不能给他们一个银行的名分，让他们几百年的游魂也有个安稳的归宿呢？几百年，他们也等了几百年了，也该等到了吧。几百年的血，都可以淌满一条江，一条湖，淹得死太阳地球啦……”最终，亚东的高远理想在中国大地上褪色枯萎，创办私人银行、利国利民的高尚之举蜕变为被民间高利贷压垮的苟且之行。《影子银行》顺着亚东人生经历的这条线索，把民间金融市场的期望、无奈、畸形、疯狂写得丝丝入扣，例如叶腊梅的永嘉抬会、毛狗的辛店抬会等，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景观。

当然，《影子银行》借助双奎人生经历的线索把期货市场描绘得更为惊心动魄。双奎在辛店的三起三落都和期货有关。当袁亚鸣塑造双奎形象时，想必他已经把自己在期货市场上打拼的经验全部注入其中了。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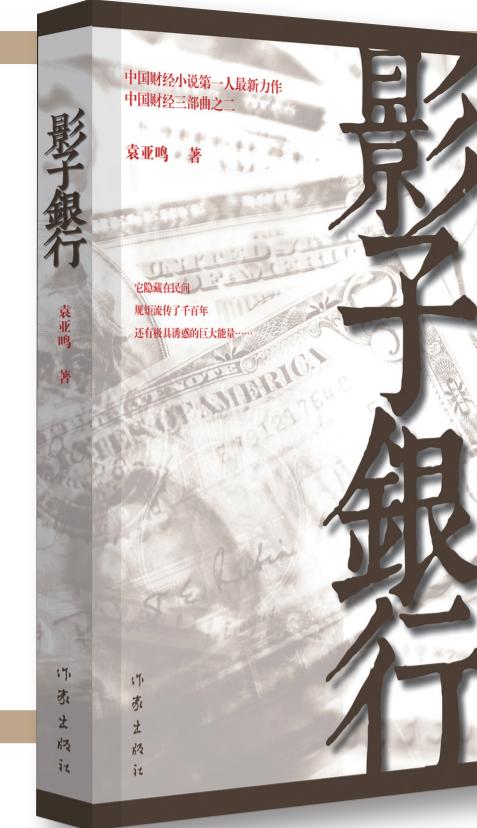
此该小说中关于双奎和赵部长、范军之间的期货战争，被袁亚鸣写得一波三折，令人大有侦探小说式的阅读快感。至于双奎形象，更是被塑造为典型的期货人。双奎好像只有在做期货交易时才有深刻的存在感，而从最初踏入期货市场如有神助开始，到最后成为期货市场这台绞肉机的牺牲品为止，双奎以他的生命诠释了期货交易的神秘和残酷。

《影子银行》的第二重意义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探索。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这样的小说题材，小说家很容易把它们处理成博人眼球的通俗题材，在类型化的流俗见解上与人性的深刻性擦肩而过。但是袁亚鸣显然并不满足于以题材的独特性取胜，他的文学野心还在于通过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这样独特的题材透析人性的独特性和深邃性。而这也正是严肃文学的崇高追求。

该小说第一部中双奎、范军和应荣富等人的期货战争就把当前中国人的自我迷失之谜写得极为惨烈，令人过目难忘。从表面上看，小说围绕着赵部长和应荣富的黄金期货战争展开，里面有多头空头惊心动魄的博弈，有不动声色的阴谋、报仇、暗杀，有桃红色的出卖色相、移情别恋等，但是袁亚鸣真正感兴趣的也许是当世俗化大潮里中国人的自我迷失的悲剧。小说人物如双奎、范军、应荣富等都是被欲望蛊惑的人，都是没有建立真实自我的异化之人。对于双奎而言，应荣富是模仿、觊觎的对象；对于范军而言，双奎则是他模仿、觊觎的对象。他们触摸不到真实的自我，总是渴望进入别人的生命中，就像鬼魂试图附体活人一样觊觎他人的存在。最终，他们都欲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里，袁亚鸣写出了最近30余年中国人的自我建构模式的悲剧性本质。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的30多年里，中国人被牢牢地控制在封闭、等级化社会的囚牢中，社会流动性不强，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压倒一切，人的自我建构模式被阶级、国家、革命等宏大词语所挟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世俗化浪潮重启，社会流动性大增，实利主义价值观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宰力量，整个社会在金钱崇拜、权力崇拜的氛围中浮沉，人们追求金钱、权力，就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他人就是上帝，与他人攀比，压倒他人、超越他人，就是世俗生存的目的和意义，人与人的自我认同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的胶着状态中，这就是当今中国人共享的以摹仿性欲望为核心的自我建构模式。袁亚鸣在该小说第一部关于双奎、范军等人的故事中就写到每一个都是他人的鞭子，都要承受他人的鞭打，最终所有人都不可能有真实的自我，都只能戴着一张空虚的脸谱，表演缺乏激情和意义的人生。

可以说正是出于对中国这种自我迷失悲剧的深刻悲悯，袁亚鸣才一再叙述期货行业的商战故事，反复地展示红男绿女的悲剧情感。如该小说第二部关于秋秋和亚东的故事就颇有意味。秋秋从小就想嫁给银行行长，后来好不容易认识了亚东，于是她就像一根藤蔓一样攀爬过去，缠绕在亚东身上，鼓动他去收购一家美国银行，结果造成错位的悲剧。从表面上看，所谓错位，是政治和商业的错位，是政协秘书长俞申这样的官员把政治当成了生意，而亚东这样的商人又把生意投向了政治的错位。但真正的错位还是当事人自我的错位。该小说曾写到吴敏黎眼中的秋秋，“秋秋要么站在你的角度上，要么站在你对立的角度上，但就从不站在她自己的角度上，安心地扮演她自己的角色，所以别人就总无法心安理得地听她说话，看她做事。秋秋常



常会先把自己错开，然后迫使你跟着她错位。”的确，《错位》写的就是中国人不能安心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的悲剧。秋秋莫名其妙地要嫁给银行行长，亚东则试图迎合她的需要去收购美国银行，都是虚荣造成的，都是没有建立真实自我的可悲表现。他们的生活都是表演给他人观看的空虚人生。因此，当吴敏黎把亚东收购美国银行的乌龙事件通报给报社，造成亚东政协委员身份被取消，当秋秋嫁给行长的梦想破灭时，秋秋就剪掉了吴敏黎的舌头以报复，展示的就是这种空虚自我的丑陋本质。

在袁亚鸣笔下，民间金融市场、期货市场主宰下的人生几乎都是被金钱和数字彻底控制的异化人生。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只要有数额巨大的金钱，就自然神气活现，颐指气使；谁一旦被金钱抛弃，谁就注定颓败不堪，如丧考妣。民间高利贷的迅速蔓延，映照着人性的贪婪和疯狂；而期货交易的瞬息变幻，呼应着人性的波诡云谲，两者纠缠一处，悲剧就比比皆是。这展现了袁亚鸣对现代人性的悲悯和批判。

《影子银行》的第三重意义就在于小说艺术的独特性。袁亚鸣的小说并不满足于交给读者一个个酣畅淋漓、通俗易懂的故事，他有着更大的小说艺术雄心。他要给类型化、通俗化、消费化的小说题材注入先锋小说的艺术特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亚鸣小说的叙事艺术。阅读《影子银行》，笔者就屡屡被袁亚鸣的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无处不在的预设叙事以及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事角度搞得晕头转向，不过，等细致理顺小说情节线索之后，又深为他的这种叙事艺术的魅力所吸引。此外，意象叙事也是袁亚鸣小说的独特之处。例如该小说中的鞭子意象、骆驼意象等，均是贯穿始终的关键意象，对于小说的主题深化和诗意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该小说题为“影子银行”，事关重大，意味深长。小说中曾写道：“中国的影子银行到底有多大，许多经济学家发明或套用过无数财经模板来测算，但无论他们的说法多么精妙和富有逻辑张力，都一样无法改变他们结论的无聊和荒谬。影子银行无穷大，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影子银行；只要有所得，就有影子银行在行动。”因此，与其说袁亚鸣的长篇小说《影子银行》是在呼吁人们关注中国的民间金融市场等，倒不如说他是要通过影子银行的神秘身影去捕捉当代中国人的深层追求，去触摸现代人灵魂的深层脉动。

(《影子银行》，袁亚鸣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出版)

我读到一本《影子银行》，它不是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影子银行》，而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是一个金融学的概念，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我把这些专业术语的定义抄录下来，无非是想证明，尽管这两本书一本是金融学著作一本是小说，但其“影子银行”是同一个含义。我读的是小说。我是带着一丝疑惑来读的，我的疑惑是，莫非作者袁亚鸣是要用小说的方式向我们介绍影子银行吗？我看到封面上有这样的文字：“中国财经小说”。据了解，袁亚鸣曾经是一位成功的期货人，他熟悉金融行业内幕，的确，这是他独一无二的写作优势，他只要真实客观地把自己的经验和体验写出来，就是货真价实的，其他作家无法复制的财经小说。我想起了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小说中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我对袁亚鸣的小说也怀着这样的期待，读完他的《影子银行》，我很高兴我的期待得到了满足。从书写当代中国的金融现实来说，袁亚鸣的确也像巴尔扎克一样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时代的书记员”。自从中国社会转型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财经小说便成了一个流行的概念，我曾读过一些冠名为财经小说的作品，比如梁凤仪的作品，但说实在的，这类财经小说多半是财经版的言情小说或社会问题小说。如果真要划分一个财经小说类型的话，像袁亚鸣的《影子银行》也许才真正称得上是财经小说，因为它真实地揭露了中国的金融现实，而且它是真正以财经为主题，是作者在表达他对财经本质的认识，更是作者对财经进行审美处理的结果。

首先必须强调《影子银行》的强烈现实性。何谓“影子银行”，以我粗浅的理解，其实就是指那些非银行机构却干着金融行为的社会组织或营利性机构。袁亚鸣的这部小说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真相，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催生了当代中国的影子银行行为，也形成了中国影子银行的独特性。经济发展需要投资、贷款，需要金钱的快速流动，但滞后的中国银行业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中国民间的“抬会”便疯狂复活，涌现出像亚东、双奎、范军等这类吃金融饭的人物，用小说中的话说，这些人物是“在做一件银行想做也做不到的事”。小说将中国当下金融活动的复杂性、诡秘性和多样性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带着读者进入到中国金融活动的灰色地带，在这里，银行、证券、期货、实业等纠缠在一起，如一头头困兽在争斗，体制内与体制外、国有与民营相互渗透，面目变得模糊不清，既加速了经济的运作，又在酝酿着一股股暗流。这一切均构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比如亚东所成立的担保公司，其操作方式可以渊源于民间传统的“抬会”，但它有合法执照，有银行支持，还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做广告，很难以西方正规的金融学来归类，这就是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介乎正规银行和地下抬会之间，它表面上比市场经济自由，骨子里却是缺乏管理，存在难以预料的隐性危机。亚东是中国影子银行造就的金融奇才，然而，尽管他聪明，却也只能在中国影子银行畸形发展的大势中沉浮，最终仍逃不脱走失踪之路的悲剧。赵部长这个人物则充分表现出中国金融活动的诡秘性。赵部长看上去应该是一个执掌大权的官员，能够左右逢源，发号施令，但他的具体身份一直是个谜，仿佛他必须藏在幕后才能发挥作用，为此他还整容，甚至连熟悉他的人有时都认不出他来。这种不可捉摸和犹抱琵琶的状态不正是权力干涉金融的最传神的写照吗？总之，我从这里学到的关于中国当下影子银行的知识，也要比从金融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所学到的知识还要多。

当然，《影子银行》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其强烈的现实性，而且更在于作者是在将人物的财经和金融活动作为文学审美的对象来处理的，在袁亚鸣看来，人们在影子银行里的搏奕，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精神行为。一切精神现象将在这个地方得到浓缩和放大。人们一般会认为经济行为就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动机来自欲望。但袁亚鸣要告诉我们的是，与欲望和利益相伴随的还有精神。比方亚东，显然是少年时代的抬会经历刺激了他，当年他帮一个抬会的会主叶腊梅做些事，还认叶腊梅做寄娘。当叶腊梅因为抬会失败被处以死刑后，他痛苦地喊道：“娘，你死得冤！我要当一个银行家，为你！”亚东从此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银行家这个理想上，他的许多行为在常人看来都不可理解。但亚伟能够理解他的哥哥，在亚伟看来，亚东一直专注于影子银行，是“一个最终没有在现实生活里找到至亲至爱的人”转换了他表达爱的方式，把爱转换成一种“专注”，而这样的转换“同样是强大，甚至是感人的”。小说反复写到亚东最痛恨女人，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如此设计他的人物，但读到后来，亚东只是为了满足相恋女人秋秋当行长的愿望而作出收购美国大班岛银行的决定，我就明白了，其实亚东痛恨女人不过是他将爱变成专注于银行家的一种表现而已，但他又不能真正熄灭他内心的爱情火种，一旦爱情之火燃烧起来，就有可能让他的头脑发炎，他的精明的金融思维也会错乱起来。袁亚鸣从影子银行中发现精神现象，并试图梳理出一条条清晰的精神轨迹。比如影子银行中的道德和信仰。从叶腊梅到李健，再到亚东、亚伟，民间的抬会形式仿佛在进行接力跑式，始终有人接过那根烫手的接力棒，继续向前奔跑。为什么抬会有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也许不仅是因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当亚东得知李健还在替死去的叶腊梅还钱时吃了一惊，李健则告诉他，抬会之所以能持续几百年继承下来，就因为它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信用体系，它的信用不是靠什么制度和法律来维系，靠的是“是良心，还有亲情”。后来，亚东对此有了更深的体认，他曾以自己的体认开导亚伟，说在影子银行的行为中免不了牺牲，但牺牲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荣誉，“因为声誉而继续，因为有了继承，声誉才一直可以延续，值得一茬茬的人继承下去”。所以，这又是一部关于影子银行精神现象分析的作品。

《影子银行》的叙述也很特别。小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但明显又糅进了不少主观的成分，从而使小说带有现代小说的风格。我相信袁亚鸣对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并不陌生，但与其实说他是在向现代主义学习，还不如说是他在寻找一种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他对财经和金融的特殊理解的叙述方式。在他看来，影子银行充满了诡秘性和不确定性，如果以纯粹的现实主义方法来讲述，当你把一切问题都讲述清楚了的时候，影子银行的诡秘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消失了。于是袁亚鸣的主观感觉便加入了进来。因为事物本身就是扑朔迷离的，因果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真相往往会有多种面孔。小说常常进入到主观化的情境之中，那些具体的细节似乎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但似乎又是作者的主观性想象。小说写到不少人的死亡，他们似乎是自杀，又似乎是被人精心谋杀。作者将真相的多种面孔呈现出来，每一副面孔的呈现又分明留下作者主观的印记，但他就是不作出明确的结论，而是让读者去推演其相关性。影子是一个重要的意象。袁亚鸣大概是影子银行中的“影子”二字得到启发，其实每一个人的命运中都会发现另一个人的影子。一个人不经意间就成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影子。他用了不少笔墨来写他们的影子。比如亚东与亚欣在公园的草坪上骑车，亚欣连车带人冲进湖里淹死了。母亲林岚认定这是亚东因为过年没有得到一件新衣服而故意害死了亚欣。是亚东的故意，还是亚欣自己的不小心，我们难以确认，但可以确认的是，从此亚欣就成为了亚东精神上的一个影子。亚伟后来也有一个精神上的影子，这就是他在食堂工作时开小货车无意中撞死了一个孩子，从此孩子倒地的幻象便“成了他内心深处一幅色彩绚丽的画”。当他难以忍受影子银行的折磨时，他竟选择了在孩子出事的地段，要以孩子同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可以说，在袁亚鸣的主观意识里，影子即是生命的痕迹，他从影子银行中看到了：“生命是一种启示，无时无刻不在造就这样的一种气势：生活互为因果。”但袁亚鸣并不敢断言他把一切因果关系都搞清楚了，他只能说这些还是一个谜，比如他在小说结尾说：亚东的“行走一直在让人遐想，他的行走一直是个谜。”因此这部小说其实是一部关于谜的叙述。这正是袁亚鸣叙述的特别之处。

茶汤里的世态人情

——读冯骥才《好嘴杨巴》有感 □金石开

是这三言两语，此外再无任何多余的笔墨。聪明的读者自然会从这漫不经心的描述中读出深意。经营茶汤馆的杨七杨巴想必不是出身于富贵人家，否则也不用既做老板又做伙计，亲自动手跑腿来挣这辛苦钱。这两位是否家有老人，是否娶妻生子，作者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交代，读者也不必多问。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只有一些基本的人生经验，便知道行走江湖的艰辛。“做的比大买卖还红火”，恐怕也是杨七杨巴良好的自我感觉。

即非亲戚，俩人此前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练和挫折才走到一起呢？天下无双的绝配，皆大欢喜的巧合，反映的却是俩人在各自轨迹上摸爬滚打，最后萍水相逢，到底是一件小概率的事情。作者看似无心插柳，却让人们在天津卫码头上来来往往、奔走江湖、艰难行进的生存状态留在了油墨间的空白纸张上。可以说，杨七杨巴做汤卖汤是绝活，冯骥才写卖茶汤的人也是一手绝活。没有迂回反复，没有过多铺垫，但却让人对俩人的绝活充满好奇。

高手出场后，自然会展露“绝活”。这绝活当然离不开一个吃字。只不过是把炒熟的芝麻碾碎，捏两小撮撒在秫米面里而已。叫做茶汤，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茶，卖点也不是茶水搜肠刮肚下油水的现代作用。茶汤是秫米面，还要有芝麻，恐怕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需要随时补充

营养的需要。把芝麻炒得焦黄不糊，然后再碾碎，就把这种农产品的营养和香气发挥到极致。“先盛半碗秫米面，便撒上一次芝麻，再盛半碗秫米面，沏好之后再撒一次芝麻”。不同寻常之处只是多了一些芝麻。作者在写高手的脑袋灵活、人情练达，其实也是在辛酸地告诉我们，喝一碗撒了两层芝麻的茶汤，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可是，真正的绝活却不是“做汤”，而是“卖汤”。“手艺再高，东西再好，拿到生意场上必得靠人吹。”“买卖人的功夫大半在嘴上。”作者如是说。原来，这“杨家茶汤”的最大绝活是“卖汤”，就要靠人、靠嘴。故事看似离不开舌尖，但却由吃喝变成了关系，逐渐步入高潮。“逢场作戏”、“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见风使舵”便是这个关系网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李中堂来天津，府县道台们想的不是怎么汇报工作，而是拿什么好吃的招待中堂大人而绞尽脑汁。或许，李中堂原本不是来检查工作，而是来品尝天津美食的。这事说怪也不怪，中堂大人虽然贵为京城豪门，吃尽山珍海味，可他毕竟是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小时候不一定能天天吃饱肚子。可是，府县道台们为举荐“杨家茶汤”而洋洋自得时，却不知道马上就要惹来杀身之祸。李中堂误把茶汤中精心准备的芝麻当作脏物而一把将茶碗推在地上摔个粉碎。正当旁边的府县道台不知所措、不明就里的时候，杨家茶汤的“绝活”救了

他们一命。原来，只有杨巴看出李中堂推翻茶碗的原因，并迅速地圆了场，为“不知道中堂不喜欢吃芝麻”而请罪。试想，以李中堂疑似有脏东西顿时就推翻茶碗的骄横，应该是马上就会破口大骂，紧接着就要惩罚治罪。可是这杨巴，就是利用这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分析问题，制定危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这绝活，不仅靠嘴、靠眼睛、靠脑子，还要靠身体。说到底，最后凭的还是人性。人们在夸奖杨巴眼明手快、聪明绝顶并羡慕他因此获得重赏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一件十分反常的事情看得合情合理，我们已经不会问，为什么不向中堂大人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之后中堂大人为什么不原谅？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型社会，人最大的障碍是关系，关系就是位置，位置靠的是权威，权威就需要规则。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他们的规则就是，大人不会错，李中堂一旦说那是脏土那就是脏土。

“杨家茶汤”改为“杨巴茶汤”，不是老板说了算，是那些喝茶汤的人说了算。他们到底是认茶汤呢，还是认关系呢？恐怕那时天津卫的老百姓，就像那些喝茶汤的人一样，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们，一会儿把吃喝当秤砣称关系，一会儿把关系当秤砣称吃喝，称来称去，把两种东西称成了一样。

(《俗世奇人》，冯骥才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生活在一个传统农耕文化的国家，长期处在定居状态，人和人之间最讲究的是关系，要“论理”，要“规矩”。同时由于资源匮乏，生存始终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吃，就是人生在世的最大问题。看我们的历史，像现如今这样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日子还真不多。可以说，中国人对吃的理解已经渗透到血液里。冯骥才的《好嘴杨巴》就是关于吃和关系，关于天津卫茶汤馆的两位老板兼伙计名扬津门的故事。作家冯骥才，把一个舌尖上的关系型社会现世在一碗茶汤里，也真是一绝。

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叫杨七、杨巴，一个有做茶汤的绝活，一个有卖茶汤的口才，一个生产，一个销售。这两位茶汤高手非亲非故，只是“俩人的爹都姓杨罢了”。作者介绍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就

精神现象分析和谜的叙述

□贺绍俊